

书海漫笔

李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书 海 漫 笔

李 星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书海漫笔/李 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铁路分局印刷厂印刷

78 × 1092毫米 1/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89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419-4162-X/G·3622

定价: 4.20元

农商城籍评论家

——关于李星（代序）

初识李星，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和一个特殊的情节之中。

毛泽东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给冰天雪地的中国吹来一缕悠悠春风，长期冰封的文学艺术界一如初春的延河，冰面开始有了一点点化解，我们延安的臭老九立刻茵集在一起召开什么创作讨论会。讨论的什么，已不大记起，记忆深处留下来的，唯有从西安赶来延安赴会的李星的玉容倩影。他第一次走进延安凤凰山下我们蜗居的石窑洞，肩头扛着一个大包。他的个子很小，而那包却出奇的大，似乎是一幅不合比例的夸张了的漫画。及至弄清包是母亲托他带给我们抵御寒冬的棉花，因西安的天气恶劣，飞机一次次的改变起飞时刻，而他就一次次把棉花包扛来扛去出入机场，感动之际，我的脑际间就永远有了一个李星扛包的定格影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其内涵不仅在于他的助人为乐，而更在于他的如牛负重，在于他也许是一个坚忍不拔背负着沉重行囊的跋涉者。我的这种感觉，随着我与他此后的长期共事与交往，不断地得到印证，而且至今仍在一天

天反复强化。

我们同在作家协会大院里工作，又同在作协家属楼里过日子，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碰面，正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白天他在办公室看稿编稿，夜晚他在办公室写稿改稿，而衔接这上班下班的空隙处，就是他为一家人的生活辛劳。他要么推着一袋面，要么拉着一车煤，要么就是两手各提一个大网兜，一边装的是萝卜青菜，一边装的是豆腐大肉，在他提着两个大兜与我一同上楼的时候，他那打夯式的脚步声与吴牛喘月式的喘息声，永远都在显示着生之艰难与沉重。每当这种时刻，我就忆及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脑际间就浮现出那个扛着大包的定格。

。中。文。青。春。网。来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示群画《业图》漫事干关家生浓著手

前些年，每个月我们都要去岐山县校对刊物清样。李星的故乡兴平县境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坐在面包车里，凝望着肥沃平坦的田畴，他的乡情总会油然而生，并且象抒情诗人一样对你倾诉。童年的家乡在他看来，就是一首首抒情诗连缀而成的。那平展展的沃土，是变幻无穷的游乐场。和小伙伴们一同去拾柴，一同去挖菜，一同去割猪草。田野象绿地毯，在上边摔跤，打滚，白粗布裤子都滚成了绿色。要么，逮大雁。大人说人躺下不动，大雁以为人是树叶，它不在意，你就会逮住它的翅膀。但他们始终没有逮住过大雁，却滚了一身狗屎和牛粪。有月光的夜晚，大人们聚在巷道里谈天说地论古经，孩子们就跑到田野去逮兔，或者去偷西瓜。夜已很深了，大获全胜的他们仍然在玩游戏，兴高彩烈的唱着：

金丝笼，

搓麻绳，

麻绳碰得开，
把你的老将杀过来，
麻绳碰不开，
把你的老将杀过来……

这家那家的大人都在呼叫，却怎么也把他们叫不回家。麦子成熟了，老老少少都在龙口夺食，白天在麦行子里钻着割麦，太阳毒得就象刀子，割得脸和身上一层一层地蜕皮，他跟在大人们收割过的空地里拾麦穗。黑夜没月亮，照样跟着割麦的大人，为的是坐在门头吃新麦面馍，吃凉面，喝沙果叶子茶。麦收了，父亲种菜，他赤着脚丫子，在雨浇过、水流过、太阳晒过的小径上铺个干毛口袋睡觉，太阳从树的空隙中照耀着，小蜜蜂嗡嗡地飞着，花蝴蝶有时偶尔飘落在面颊上。井台边尽是未栽而自生自长的马蓝花，蓝幽幽的花悠悠地绽开，象宝石那样蓝，清纯，幽香，柔软。家家的小孩都坐在井台上，向邻近的井台喊话，一边咀嚼从花苞里剥出来的小毛杏。杏子黄熟了，一个赶马车的问要卖多少钱，他狠狠心要价：一毛钱！赶车的说行，给了他一毛钱烂票子，用草帽端走了他家的七十颗大杏，他激动万分，他终于有了属于他的一毛钱，太美好了，快乐得在地上打滚儿……夕阳西下，马车，古道，唐藩，旅人。那一种感觉的确太美好太强烈，参加工作之后，总想回故乡寻找那种感觉，可惜再也难以找到……

人为什么常常忆及童年？为什么一回忆童年就充满甜蜜与幸福？大约是因为成年的沉重逼迫人寻找逃避之地，没有别的去处，只得在遐想中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戏嬉之中以期轻松。李星的童年回忆，大约也遵循着这样一个共有的原

因。其实，即是童年，李星那欢快轻松的生活里就已经包藏着沉重。一个夏天忙过，几乎全村人都累病了。那些鲜活的水灵灵的花儿一样的媳妇姑娘也都被霜杀过似的，萎蔫，憔悴，疲累。但是，脱皮掉肉的辛苦并不能改变匮乏拮据的农家生活。进城赶会，路过姐姐家，他想要一点钱，作了新媳妇的姐姐很作难，翻遍新房，只在炕席底下找出五分钱。她愧疚万分，只能拚一碗然面安慰弟弟。姐姐的这种难言神情至今仍然在李星的眼前浮现。土改了，父母带着他参加斗争会，从此，打人，流血，割指头，那些惨烈的画面又构成了他的梦魇……他慢慢懂得，农民不仅善良勤劳，也不乏瞅红灭黑，趋炎附势。弱肉强食的法则同样笼罩在牧歌式的远离陇海铁路的他那偏僻的田园之内。冷眼和争斗，似乎也是乡间的人情定势，在为针头线脑而没完没了的纷争中，你除却感到压抑，便是无可奈何。成年之后，他才真切体会到“近乡情更怯”的况味。想回家，又怕回家，不得不回家的时候，大清早就去田野独自散步，而整个白天把自己关在屋内，足不出户。如果有一天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他愿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盖个房子独居，不愿在村巷里驰过见人。他愿像孤魂野鬼在田野里独自转游，愿在母亲的坟旁独自徜徉，却不愿在熙来攘往的熟人中间虚与应酬……这就是李星复杂的乡村情感。也是李星津津于向朋友乐道的一大主题。

对于母亲，他是怀着至高无上的崇敬和深爱。母亲的出身很苦，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留下她们姐弟三人。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弟弟出走在外，一去不再复返，她带着妹妹四处逃荒，又不幸丢失了妹妹。她扭动一双小脚流落到杨贵妃赐死的马嵬坡附近，经人介绍进了李家生儿育女，把善良宽厚

息事宁人的性格和气质传给了李星，也把聪明智慧传给了李星。父亲因为穷困和劳累常常大发雷霆之怒，而母亲就只好逆来顺受。她的慈爱是永远让儿子刻骨铭心的。李星离家进京上大学以后，母亲思子心切，每天下午就坐在村口听火车叫，希望火车把儿子拉回来。李星知道后非常难过。母亲曾因心肌梗塞死过一次，已经被家人停尸床上。后来她又复活了，一清醒，就嘱咐人给刚刚从西安赶回家的李星做饭。她让其他人都离开，唯独把李星媳妇拉到身边。平日不管吃糠咽菜，只要李星回家，母亲就给他做一顿白面。困难时期，母亲把白馒头和仅有的清油都留给在外上学的小儿子。母亲恩重如山，她逝去了，李星觉得一下子失去了根。过去无论走到天南海北，潜意识里都有可以归宿的家，这个家总是和母亲联系在一起。母亲死了，就觉得整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那么无条件地无私地爱他了。刮风下雨的晚上，突然会感到是自己把母亲扔到荒郊野外，内心就刀绞般的疼痛。他对人的感情，对美的感情，实际上就是对母亲感情的转移。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他却坚信这是事实……

说起上学，李星的眉宇之间就充满自豪。他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家里的吃粮要依靠父亲种地，花钱则依靠母亲卖油饼。晚上合面，清晨炸饼，母亲没有时间为他做一双御冬的棉鞋，他那夏天可以在田间土径上自由徜徉的赤脚片子，却无法踩着铺地的冰雪去进校门，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没有学过，三年级开始上课，那功课对他就象小菜一碟，算术题十分钟就做完了，经常无事可干，就读闲书。两个小时的考试卷子，二十分钟就答完，经常被同学老师怀疑

没有答完。代数老师将信将疑地提问他，他对答如流，老师激动得朗声宣布：完全正确，就他一个一百分。他的门门课都是尖子，背着馍上学去，从巷子里走过，老人们就说：人家将来是外头人，是吃公家饭的。而一同背馍求学的同学则对他说：我们是给你做伴的。小学五年级，四十万字的《保卫延安》他只用三天就读完了，至今还记得书中的团政治委员说，一个人失去敏锐感觉，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读老舍的《龙须沟》，至今记得小妹妹扇到他的这本书上，让他十分痛惜。他如痴如迷地听老师讲高尔基的《在人间》，听老师朗诵自己的抒情诗：呵，麦堆，金红色的麦堆……他和书结下不解之缘。有一次老师带他们上县城拉运课本，看到满架的书，他羡慕极了，身上只有几毛钱，却对几本书爱不释手，老师发觉他的心思，垫付一毛五分钱，帮他买回他心爱的《金色的海螺》，他没用多大功夫，就已烂熟于心。父亲背一捆葱卖了三块钱，要办年货，而他对书店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馋涎欲滴，他对父亲解释说这本书能让人学本事，父亲便从大葱换来的三块钱中下狠心拨出七角钱成全了儿子，使他激动万分。他的同学说这本书是讲炼钢的，而他却懂得那是讲炼人的。从小他就好奇，求知欲强，非常爱看皮影戏，大车厢上绷个罗底，把式耍皮影，唱弦板腔，那腔调慷慨悠扬，而那皮影儿更有诱惑力，只要听到哪村有戏，他就跟着本村的货郎去看戏，深夜回家时，天黑黝黝的，走在人后边怕野鬼，走在人前边怕妖怪，只有插在人中间走路才稍稍放心。而他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就是从这里开始获得积累的。拣回来的香烟盒打上蜡，刻成小人儿，借罗底纱布绷在炕上，他自己也要起皮影。父母给的那点零花钱都舍不得

买吃的，就买剧本，《卖画劈门》、《劈山救母》、《游龟山》、《祭灵》，每个剧本从头唱到尾，也就从头背到尾，有人让他考剧团，但他的嗓子坏了，与戏无缘，可他直至今今天仍然迷恋秦腔戏，甚至在招待美国客人的宴席上，他也象秦腔老把式那样拉开架势，放开嗓子吼秦腔，他一边唱杨彦景的“儿问娘进帐来为何烦恼”，一边唱余太君的“娘不言彦景儿你自己知道”，客人和主人都笑得前俯后仰，而他还挺起腰板，一阵儿是杨彦景，一阵儿是余太君……看书看戏，既培育了他的同情心，也培养了他的文学气质。在需要学生来帮场的斗争会上，“阶级敌人”全忘了，他只记住了一个虐待自己继子的后娘，他很激动，作文时洋洋洒洒，语文老师激动得挥笔作评：运用对比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畅……尽管别的老师喜欢穿得干净长得白净的学生，而语文老师却发现了这个长得黑不溜秋又穿得邋里邋遢的小个子的价值并极力宣扬，以至于平日很少接触学生的校长也说这个学生的学习还不错，在全校大会上让他讲《大拇指的故事》。村子里考中学的学生全部名落孙山，而他这个黑小子却由学校极力推荐，保送上中学。离校前，语文老师说，你的名字李满长不好听，学茅盾、老舍，你就叫个李星，你是天上的星星。老师的灵机一动，竟应了小时候看麻衣相先生对他的诊断：肚子上有文曲星的痣。如果说，小学时他爱看的是皮影戏与闲书杂书，那么上了中学他的读书兴趣主要集中在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峻青的《老水牛爷爷》，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这些描写农村生活的名篇能唤起更加狂热的激情，上课铃响了，就放到抽屉里偷偷看，老师喝斥学生上课不准说话，他竟莫名其妙。读着读着，竟心里蠢蠢欲

动，也要写小说。有一次写成一个万把字的短篇，老师让寄给《延河》，等了多少天等来一封条退信，扫兴之余，记住了西安有个建国路。想不到后来成了这条建国路的主人之一，竟也自己编起《延河》来……

中学时代结束了，李星以兴平县报考者中总分第一的显赫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件对他来说决定一生命运的事件的意义，是过了若干年他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认识的。而当时，别人羡慕不已的事，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家里人常说，他的哪个同学不上学已经当了会计，哪个当了出纳，日子过得很好，上不上大学没什么要紧。但既然考上了，就去上吧。他穿着关中农民世代穿惯了的对门襟袄，背个被子上火车。他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不敢进车厢入座，就把铺盖卷放到过道，人就依着行李站着。不敢喝车上的水，只能啃自己背的锅盔馍。站得两腿酸困，啃得口干舌燥，晕晕乎乎到了首都，却不知该向何处。好不容易背着铺盖卷转车到东城区的张自忠路，找到了人大的语文系所在地。在一大堆穿得很洋的学生中间，这个关中冷娃自惭形秽，城市的一切对他显得陌生。跟着一位同学上街买牙刷、牙膏，听那个店主说你们这些上人大的不得了，将来都是国家干部，他也才忽然意识到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大学和中学不同，功课的专业程度毕竟高，学文艺理论，学哲学，学文学史，使他原来朦朦胧胧的理想开始变得具体起来。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在将来吃评论饭，这颗理想的种子是在一个偶然事件中发芽的。周末的晚上，他去县影院看电影，去迟了买不到票，着急地四处钓

鱼，忽然看见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并没有买票，却从大门长驱直入，一打问，原来是文化馆的一位评论家，被请来看电影的。电影迷的李星好不羡慕，他惊叹于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职业，居然可以不买票就能看电影，于是他立志也当评论家，去看不掏钱的电影。有志者事竟成。他果然成为一名评论家，但具有戏剧意味的是，现在省市电影公司经常给他送电影票，并给他发了看片证请他去看电影，他却没有时间，一次也不能去看。

大学生活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文艺理论所学的内容就是毛主席的“讲话”，权威人士解释“讲话”的讲话，以及中央的各种文件。康生把人大作为反修正主义的重点，过去的教材统统废弃，只剩下“讲话”汇编，真正讲艺术规律的理论一点没有。负责任的教师不甘于误人子弟，采取曲折的策略以便于固守学术阵地。现代文学史教授林志浩，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他利用讲文学史，加进去作品欣赏，讲鲁迅的小说，讲郭沫若的诗，让学生写某个作品的评论与赏析，这种苦心既很聪明，也很大胆，使李星在一个荒芜的年月里获得了有用的收获。他写鲁迅小说的赏析，写《陈情表》的分析，得了实际的和具体的训练。赵遐秋教授赞赏他的《陈情表》分析不人云亦云，思想很野。这无疑对穿对门襟袄的陕西关中来的乡巴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他决心沿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奋斗。但是，当打倒某某某声讨某某某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再也难以向前行驶了。

李星从小善良，不敢看可怜人，不敢看人欺侮人，对最没有地位的最受气的人能唤起最大的同情，因而此时看不惯

人斗人就是正常的了。老师说校党委是保皇的，他说我不造反。老师说你这样下去是要被历史抛弃的，他说我不造反。他的最好的朋友劝他造反，他说各走各的路。他的同情心，他的不习惯整人的情结，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他希望大小环境谐和温馨，希望永远有一个不设防的人际环境。这就是他的艺术素质，是他日后成为评论家的内在根据之一，但在这时却是他陷入痛苦深渊的重要根源。他厌恶他曾经热爱和迷醉的校园与京城。与知己朋友坐在一起，他就议论林彪江青，他不相信江青说陆平压迫她的谎言。他不愿意听谎言，也不愿意听恶语，希望很快分配，希望到一个没有声讨没有打倒的和谐温馨的伊甸园里去。

终于被分配到黄河畔一个荒凉的农场，半人深的草，一寸长的蚊子，他不相信关中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他就在这里制作着自己的荒诞戏剧、黑色幽默。

从华阴县城到他们所在的农场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他们这些下放锻炼的大学生砍掉芦苇，在沼泽地上修了一条路，到孟塬车站转运从内蒙古拉来的羊粪。装满羊粪袋子的老式汽车在沼泽地中的新路上行驶，摇摇晃晃如一叶小舟在海涛上颠簸，人坐在羊粪袋垒起的小山上本来就很危险，而生性敏感的李星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想，说不定哪一天摔下去，只要不钻到车轱辘底下就行。汽车开动了，他一边铺开草袋坐上去一边说：咱可要享受享受……说时迟那时快，一言未了，就哗的一声从飞驰的车顶上抛烂草袋一般被抛了下去……醒来之后，李星只觉得双脚火辣辣地疼，仔细一瞅，手一摸，不由得大吃一惊，腿、头、脚，全部变

了样。脚皮擦掉了，大腿一圈皮擦掉了，左眼皮擦掉了，血从几个伤口往外流，殷红一片。他清醒后大惊失色地叫道：哎呀，我的脚！前边汽车上的人以为他摔死了，后边的人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困惑莫解：大腿皮擦掉一圈，腿脚却没有砸断。这个深奥的问题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脸多少天肿得不能吃饭，有的人投他以哀怜的眼光，表现出爱莫能助的无奈。有的人却以为他是故意逃避劳动，因为他清醒后的第一句只是“我的脚”！而不是英雄人物处在这种情况下惯常要问的话：羊粪送到了没有？

他们的宿舍很简陋，顶上是石棉瓦，为了保温，又在下边漫了一层蒲草。一长排宿舍后边伸出一块，盘着吸风灶，冬天轮流烧洗脸水。这一天轮他烧热水，可他给灶里塞的草太多了，只沤烟，不着火，只好拿个簸箕狠劲扇。他一边扇一边往出拔草，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呼的一声，大火冲天而起，烧着了地上的草，烧着了屋上的草，烧着了上百人宿舍的石棉瓦棚，大火飞腾旋转，情急之中的李星，下意识脱下棉袄扑火，就象英雄一样奋不顾身。同学们发现后都来救火，总算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他去连部解释，连长正对通讯员说：这个人怎么老出事，是不是……他大吃一惊，急忙分辩，表示愿意接受处分。连长杀气腾腾地命令他不要出操，留在屋里写检查。全连人员已在室外肃然列队，连长一脸杀气就要训话，李星像放在案板上的鱼，正等人宰割。经过可怕的一阵沉默之后，却听见连长口气温和地说：今天早晨出了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今后不提了，谁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李星好不纳闷，事后才知道，是来农场检查工作的夏副师长不让批评肇事者，说学生也不愿出这样的事。这位华北

战场上有名的战斗英雄让李星至今感念不已。

在荒凉的部队农场经历几度寒暑之后，突然被分到省城的文化局工作，使他犹如走进梦幻般的世界。他遇上的第一件工作是全省戏剧会演，他所在的评论组又全是他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大人物。臂腕里搭一件衣服的王汶石，像个农民一样的杜鹏程。他们全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直到此刻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杜鹏程吃饭时没带会议证，居然被挡在门外。李星又陪军代表去看石鲁和赵望云。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子，房子一角摆一张桌子，地上飞满乱纸，石鲁形若枯鬼呆坐一旁，被他的各种废稿包围起来。李星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去代替石鲁打扫一下这间屋子，没有把那些弃置的废纸保存收集，要不然，今天石鲁的遗产会不知更有多少传世之作。他去看王汶石，这位名噪一时的短篇圣手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吸的烟竟是两毛钱一包的灰战斗。他去医院看柳青，这个瘦小的老头子正在床上睡觉，他像老长工一样把大裆裤压到脚底下，披个老式棉袄询问外面的世界。他那五十公分的小圆桌上摊开的是当年长安县委的文件，几张写满字的稿纸，旁边小茶几上放着酸梅汤、面包、牛奶。李星十分纳闷：这个人穿的那么土，吃的东西却那么洋。小老头子没有注意李星的疑窦，只是很有兴味地讲文革中批斗他的造反派要他自报反革命的身份，而他回答说：俺不能定这个性，俺是共产党员柳青。此刻共产党员柳青正在度他的劫后余生，改完《创业史》第一部之后接着写第二部……拜见过这些人物之后，土头土脑的李星眼前豁然开阔起来，笼罩在文学上边的神秘纱幕徐徐揭开，那些往日对他来

说高踞云端的大人物变得如在眼前，像他的父兄一样可以接近了，而他的从童年就蓄藏在心里的朦胧的文学梦幻也忽然变得不像过去那般虚无缥缈，似乎像在田野上追捕蝴蝶一样，只要奋力扑去，就可以抓到那个五彩斑斓的蝶翅。他不甘心在省革委会属下的文化局虚耗，要求去文艺创作研究室去实践。

先在《陕西文艺》的诗歌组学习看稿退稿，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表示因为版面关系，无法安排，特致歉意。不得不提意见的时候，又要在信中写上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后来调到评论组，既看评论稿，又看戏剧稿，还要帮助登记稿件。他不以这些琐事为意，就在这些琐琐细细的工作中，一步一步移动脚步去靠近他的人生目标。

他在编辑部发言，批判林彪“三过硬”的创作方法，同事们的反映不错；他写悼念周总理的悼词，同事们说很好；他代表编辑部起草开门办刊物的经验，领导很满意，认为他很有才。他去农村深入生活，回来后写出一篇小说《机声隆隆》，展示拖拉机站两个司机为公为私的斗争，在《延河》上发了头条，这刺激了他的创作神经，情绪空前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连的挫折。他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写成一篇《刚强老汉的一夜》，诚惶诚恐地去征求王汶石的意见，汶石直率地指出这只是一堆素材，作为一部作品远远没有完成。他以自己的老师为原型，写成一篇《淡泊老师》，征求杜鹏程的意见，老杜说不发也不可惜。再后来他以文革生活为题材写小说，同辈小说家说他写的理论色彩太重。他开始怀疑自己写小说的才能，接受了朋友的意见，开始操作起评论武器。《三突出是形而上学与唯心论的黑标本》在《延

河》刊出，是他在自己的评论史上发出的第一声春雷，他从此破门而出。当我调进他所在的延河编辑部一同当编辑的时候，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并且在全身心地投入这一攻坚战。但没过多久，我却发现，并不见得这只能是他的唯一选择，而且不一定是他的最佳选择。因为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感情裂变，使他的感情世界呈现得非常丰富非常浓烈。

早在中学时代，出身农家的李星就不情愿地涉及了婚姻领域。按照农民父母的思考，提亲要早，不然以后花的钱更多。于是媒人们不断展开外交攻势，今日来提这家，他不同意，明天又提那家，他还不同意，他不同意过一百次，突然听到姐姐给他提一个叫芳卿的，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一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好听，二来已经觉得婚姻是人生的必然课题，躲又躲不过去，还不如早解决家人就不会再来烦扰。何况姐姐说这个姑娘长得好。

一个星期天，他被领进芳卿家相亲。他是个十足的孩子，还在姑娘家的门槛上俏皮地跳了一下才跨进屋内，姑娘正在织布机上织布，见他来了，下了织机羞涩地不知如何是好。开始屋里的人很多，瞬间就象潮水退去，只留下他和她像两条鱼晾在沙滩上。一盏煤油灯亮着，这是说悄悄话的氛围，但似乎什么也没说，只记得他给了她五块钱。姐姐问他姑娘长得怎样，他说不知道；问长头发短头发，他说不知道。姐姐说她自己看看去，结果拿回来一方手帕，这件终身大事似乎就这样定了。

大学里，两派正在打内战，家里写信让他回去。他下了